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 / 编

巨变中的理论迭代

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集萃（2015—2017）

SELECTION OF NEW
THEORIES ON
GLOBAL CHANGES
(2015—2017)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80周年
暨信息研究所庆80周年系列丛书
主编：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 / 编

巨变中的理论迭代

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集萃（2015—2017）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SELECTION OF NEW
THEORIES ON
GLOBAL CHANGES
(2015—201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变中的理论迭代：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集萃：2015—2017/《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暨信息研究所所庆40周年系列丛书）

ISBN 978-7-5520-2335-0

I. ①巨… II. ①国…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96500号

巨变中的理论迭代：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集萃 (2015—2017)

编 者：《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

责任编辑：熊 艳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10×1010毫米 1/16开

印 张：37

字 数：563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335-0 / C · 167

定价：1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创刊于1958年，是新中国首批涉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类杂志。杂志主要译介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理论动态、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目前编辑部拥有300余种外国刊物、智库及国际组织定期报告等信息资源。杂志连续三期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12、2014、2017三版）。



俞平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意产业，曾参与主编《国外社会信息化研究文摘》。

- **全面创新改革**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体制机制问题
王振 等 / 著
- **创新解码**
理论、实践与政策
赵付春 / 著
- **产学研协同创新**
形成、识别与效果
胡雯 / 著
- **激活数据**
智慧城市未来发展
全球城市信息化论坛秘书处 / 编
- **放眼全球**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
徐觉哉 / 著
- **全球正义**
国家主义与全球平等主义
俞丽霞 / 著
- **巨变中的理论迭代**
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集萃（2015—2017）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 / 编
- **比较与鉴别**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
朱美荣 / 著

责编邮箱: xiongyan@sassp.cn

豆瓣小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新浪微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官方网址: www.sassp.cn



微信公众号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
暨信息研究所所庆40周年系列丛书

编审委员会

顾 问

张道根 于信汇

名誉主编

王世伟

主 编

王 振

副 主 编

党齐民 丁波涛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全 李 农 高子平 轩传树 沈结合

俞 平 唐 涛 惠志斌 殷皓洁

总 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历史可以溯源到1959年建立的学术情报研究室,1978年10月正式成立学术情报研究所,1992年12月更名为信息研究所。建所以来,信息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一直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与信息科学的发展步伐而不断调整,目前已发展成为从事重大战略信息和社科学术信息汇集、分析的专业研究所,现有在编人员45人,设有6个研究室、1个编辑部和3个院属研究中心,承建“丝路信息网”“长江经济网”两大专业数据库和“联合国公共行政网(亚太地区)”,承办“全球城市信息化论坛”和“一带一路上海论坛”。

成立至今的40年里,信息研究所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专业的学术情报研究资政建言、服务社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所40年是信息研究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未来信息研究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优化学科配置和人才队伍,努力建设以重大战略情报信息研究为重点,以专业大数据库建设为依托,以各类论坛、智库报告为载体的新型情报信息研究体系。

值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60周年暨信息研究所建所40周年之际,我们策划了这套院庆暨所庆系列丛书。丛书共8册,内容涵盖科技创新、城市信息化、科学社会主义、国外社会科学等领域,既有信息研究所的传统优势学科,也有近年来新的学科增长点。我们希望以这种形式,总结并展示信息研究所40年的发展历程及最新成就。期待这套丛书能成为本所与社会各界分享研究成

果的纽带，也能激励本所员工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实现信息研究所的发展目标而不懈努力。

王 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

2018年6月

目 录

第一篇 国际政治

西方理论主导世界：国际理论中的西方偏见	3
回归理性：西方外交政策政治现实主义的复兴	8
美国世纪终结了吗？	30
尴尬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38
战略相关线路图：欧盟在东南亚的安全政策选择	44
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秩序是否正在瓦解？	50
我们的外交政策选择：重新思考美国的世界角色	57
欧盟未来白皮书：对2025年欧盟27国的思考和设想	68
亚洲地缘政治的四个方面	80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怎样加强政策一致性和问责制	87
欧洲外交政策与欧盟治理危机	92
全球化的未来	98

第二篇 中国方略

“一带一路”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113
中国的影响力投资：“16+1合作”的前景	118
分化却不树敌：中国“16+1”的形象问题	120
新兴的“一带一路”政治经济学：在中亚及其他地区促进“互联互通” 所面临的挑战	125

欧盟与中国领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转型 137

第三篇 全球经济

重建欧洲的共同未来——欧元区的发展与改革并行 167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年：失实的控诉，喜人的成果 203

《贸易促进授权法》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景瞻望 226

揭开全球化的面纱 233

全球化思考，本地化创新 246

试论贸易与竞争力 255

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272

第四次工业革命：它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它 279

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五种路径 286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市民社会意味着什么？ 292

藏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危机 295

国际经济治理：二十国集团最后的机会？ 298

发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战略潜力 311

重新审视现有信用评级机构对金砖国家的意义 332

东盟经济共同体评估 340

TPP的终结：美国衰落的征兆和东盟的应对 344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响 350

贸易平衡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 357

第四篇 信息前沿

未来的民权与大数据问题——关于社会公正与技术的报告 371

社会契约2.0版：大数据·隐私保护·公民自由 382

超越国界：抗击数据保护主义 387

大数据如何改变颠覆性创新？ 396

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创新 399

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及中央银行是否构成威胁?	412
保护与发展数字经济报告	422
人工智能和未来战争	426
数字红利	438
欧洲的数字力量: 从地缘经济到网络安全	445

第五篇 系列年度报告

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	461
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指数	466
2015年全球人力资本报告	474
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有利于发展的创新政策	479
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502
2016年全球人力资本报告	505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523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全球创新, 制胜之道	529
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537
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	543
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 创新助力世界(第十版)	550
2017年全球人力资本报告——为未来工作准备人才	560
全球竞争力报告(2017—2018年)	573

西方理论主导世界：
国际理论中的西方理论

第一篇

国际政治

西方理论主导世界： 国际理论中的西方偏见

选自《哈佛国际评论》2014年9月10日

亚历克斯·杨（Alex Young）

王赛锦/译

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会假设，通过他们的项目，能探索出真理，并能对国际范围及其运作进行比较客观地理解。不过，大多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都受到一些偏见的影响：它们是西方国家的作者为西方读者而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向“西”倾斜，这会削弱其解释和产生社会福利的能力。

许多西方偏见基于西方的历史性政治和军事霸权；胜利者书写历史，政治哲学论似乎也是如此。阿米塔夫·阿查里雅（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他们2010年出版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展望亚洲及全球》（*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一书中写道，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派都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产物：现实主义来源于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霍布斯（Hobbes）及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作品；自由主义源于康德（Kant）、洛克（Locke）、史密斯（Smith）等；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是德国人；即便是强调相对主义和多样性的建构主义和后现代的国际关系也很大程度上源于皮埃尔·博蒂奥（Pierre Bordieu）、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法国作家。当然，孙子（Sun Tzu）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这样的非西方人也为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总体上来讲，西方声音主导了整个国际关系史。

这远非历史遗留那么简单。经济学和心理学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问题的基

础。人们越来越多地应用博弈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国际事务，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与假设、意识形态、行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结果纠缠在一起，与此相关的大量知识都明显带有西方倾向。人们对应用博弈论本身并没什么偏见，但是随着其在现代学术圈中的应用，西方人的特权就明显优于其他背景下的人。社会心理学家本着方便的原则选择受试者，也就是说，西方研究员选用的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是西方人。对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生成的大量知识都被认为是揭示人类普世真理的，但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指向特定的文化。1995年，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研究生乔·亨里希（Joe Henrich）前往秘鲁，研究原著居民的经济行为。亨里希发现，同样是在模拟博弈论的情境下，他的受试者与北美的受试者表现却大不相同。北美人在博弈中普遍渴望对资源进行公平分配，并要求奖励这种行为；秘鲁原著居民则看起来并不怎么关注公平问题。这并不是说一些文化、种族或区域团体在博弈中就或多或少地比其他的更理智；任何形式的博弈都没有固定的好坏之分。相反，亨里希的发现仅仅是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相应地就会转换成不同的目标和战略。亨里希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及文化地区反复进行这一实验，观察跨文化背景下人类的行为。这些发现挑战了长久以来博弈论研究的普遍西方立场——揭示了人类的本质特征。他的工作指出了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研究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绝大部分受试者都是西方人，得出的结论是不同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方式普遍无差别。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关于人类本质的概念是西式的，是通过研究西方受试者而得出的，却被错误地用于全球各地的人们。即便存在着这些限制，应用博弈论仍在主要出版物中被广泛用来解释普京的行为以及2013年春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所造成的紧张。

此外，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思想家的产物。2011年，排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前25位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项目中，美国有19个，英国5个，加拿大1个。无一例外，全部是西方国家。同时，《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揭示全球大学社会科学2013—2014年的排名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29，而在这之前排名几乎全被西方所包揽。2013年关于政治及国际研究的《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前40名里只有7所是非西方的大学。当然，这些是西方出版物上的西方排名，或许也正是西方新闻业带有西方偏见的一个例子；极少数非西方的国际事务项目能

登上排行榜,说明他们认同西方排名。即便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自2003年创立以来,也只有2所非西方高校荣登前50名。这些排名也表明西化性的国际关系知识根基深厚,源远流长。

负责国际关系研究及教学的西化学者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研究身份对研究结果会产生很大影响。这也是立场论的争论焦点,一派认为被边缘化或受压制的个体应该拥有获得知识和真理的权利,而这通常是被主流排除在外的。例如,遭受西方政治军事统治长达数世纪的非西方人,很难为国际事务提出新奇且有见地的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颇为重要的观点。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思想在西方机构里的产物,不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理论,更不可能适用于任何情形。

西方偏见的危险在于它排斥那些可供选择的、非西方化的观点。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单一化会限制我们发现真理,也会对我们现有的知识产生污染。考虑到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变得日益重要,如同一个有价值的商品,上述问题就显得尤其棘手。知识和信息逐渐成为经济价值及权衡经济成功与否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诸如生产能力及技术等物质因素是力量的来源和历史的推动者,但是,我们现在更可能的是生活在所谓信息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这里,知识的传播成为力量最重要的来源。例子比比皆是。从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中可发现,互联网的高速连接每增加10%,经济增长就会上升1.3%。美国政府情报工作的预算自2006年以来就一直在增加,现在达到每年800亿美元。卡尔·太郎·葛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eld)最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强调,搜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对于构建社会和文化资产至关重要。如果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了现代历史的进程,而西方人又主导了对国际事务方面的真理的追求,那么,世界上的很多人就无法参与到重要的世界演进及其发力过程之中,这毫无公平可言。有西化倾向的国际关系研究排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对国际系统知识的追求,防止他们接触由此带来的利益。这种排斥似乎并不是一些有意的或恶意的大阴谋。把这个归因于西方的某个人是不对的。相反,这是有机增长及历史自然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结果。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霸主地位看作感染学术界的疾病更合适一些,它既损害了西方人的利益,也损害了非西方人的利益。国际关系思想的非普遍性使得西方理论家无法很好地理解国际系统,也很难寻到真理。种族主义的把戏具有隐

蔽性，对世界各地及各文化圈追求真理的行为都会造成损害。虽然不是有意而为之，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却依旧认为：“一种理论总是出于某种目的，为了某些人。”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也是为了西方人，虽然它本意并非如此。

现在，不同的观点也可能起作用。或许并不是西方偏见，而是国际关系理论受制于区域的狭隘性。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在我看来，国际关系思想呈现出西化倾向是因为我是个西方人，任职于西方的机构，在西方出版物发表作品。也许中国作家会觉得国际关系理论表现出了中国或东方偏见。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却很轻微；我们可以忽略它。阿查里雅和布赞关于西方偏见的那本书，强调了来自印度、新加坡、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国的杰出大学教授作出的贡献，而他们也一致认同，西方理论在全球国际关系领域占了绝对主导地位。伊斯坦布尔Bogazici大学的学生很少能读到非西方作家的作品，在他们的政治科学课程里，几乎碰不到土耳其理论家。全球范围内，人们更可能听过意大利政治家和理论家尼可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名字，而不大可能叫得出印度早期学者慕克吉（Kautilya）的名字。因此，区域狭隘性的假设看起来是错的，西方理论主导全球，不仅仅是在西方。

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有些清晰了，解决方案却并非如此。两种可行的措施可能会补救西方关系理论主导全球所带来的糟糕境况。第一种是创立出一个全球联合理论。描述国际体系的大量知识要做到精确、诚实、客观，且不能过分关注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其任务是将全球事务方面的学术研究从特定的文化、地区以及群众团体中分离出来，这绝非易事。从立场论的角度创造出一种合理的情况是可能的，但是对国际事务如此整体且全面的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特定背景下的思想家的产物。换言之，文化背景下的人不可能创造出超越文化的思想。第二种可能超越西方偏见的方式，会牵涉全球事务理论的多元化问题。这种解决偏见的方法要求，承认理论必然与文化相交织，但可努力使各种理论家的多种理论为人所知，并具有合理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可同时存在，彼此差异很大，但是学者要形成一个传统，即承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理论以及它们的潜在正确性。理论传统间的“异花授粉”当然可能发生，也可能会开花结果，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论会共存。第二种解决方案看起来更可行。为了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实现多元化，学者们必须自己学习而且教授他